

“论语派”论



· 吕若涵 著



三联文博论丛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派”论 / 吕若涵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6

(三联文博论丛)

ISBN 7-5426-1682-X

. 论... . 吕... . 论语派 - 文学研究

.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1126号

“论语派”论

著 者 / 吕若涵

丛书策划 / 苏 孟

特约编辑 / 陈琳琳

责任编辑 / 刘宏伟

装帧设计 / 范 峤 青

责任校对 / 朱倩倩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订 /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2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90千字

印 张 / 10

印 数 / 1-3100

ISBN7-5426-1682-X

定价: 20.00元

目 录

总 序..... 钱谷融（1）

导 论 （ 1 ）

第 一 章 从《语丝》到《论语》..... （ 1 ）

第一节 语丝时代的终结..... （ 2 ）

第二节 “ 变风 ” （10）

第三节 文化“ 习性 ” （ 23 ）

第 二 章 现 代 性 个 人 主 体 的 坚 执 （ 34 ）

第一节 寻找思想文化的立足点..... （ 34 ）

第二节 “ 非政治 ” 的政治姿态..... （ 45 ）

第三节 边缘化的困厄..... （ 62 ）

第 三 章 “ 小品文 ” 的文化隐喻..... （ 79 ）

第一节 八股的反动与言志的自由..... （ 80 ）

第二节 从英雄心态到凡人哲学..... （ 91 ）

第三节 反修辞与“ 平淡的谈话 ” （ 100 ）

第四章	审美情感的价值重构	(107)
第一节	焦虑与反思	(108)
第二节	闲适主义与幽默主义	(118)
第三节	闲逸静趣与生活的艺术	(129)
第五章	日常感兴与快乐主义政治	(148)
第一节	具体主义者的感觉样态	(149)
第二节	小人物的快乐主义政治	(159)
第三节	反体系的文体意味	(174)
第六章	刊物：大众取向与话语空间	(183)
第一节	“人间世”品：“灵韵”的消失	(184)
第二节	“宇宙风”格：规训与提升	(206)
第三节	“论语体”：合法主义的反抗	(218)
第七章	论语派与晚明小品	(245)
第一节	现代与传统的对话	(245)
第二节	颓废：解脱与适世	(258)
第三节	本土与西风	(272)
后 记		(280)
主要参考文献		(283)

第一章

从《语丝》到《论语》

“从《语丝》到《论语》”的命题，在前人的议论中曾具体化为周作人“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或是胡风《林语堂论》所下的结论：林语堂从他的“黄金时代”走到“个性的拜物教徒和文学上的泛神论者”。曹聚仁同情地说，《论语》创刊“这是《语丝》停刊以后的文坛一件大事”，并以“言志派的兴起”概括之。苏雪林说，《语丝》是“在那火辣辣时代里提倡‘闲适’和‘风趣’，以自由思想相标榜的文艺刊物”，而《论语》“可说是由《语丝》的‘个人主义’，‘情趣主义’一个道统传衍下来的，不过更加一个大题目，便是‘幽默’的提倡”。人们的确抓住了语丝派与论语派两个文人群体的内在脉络。但是论及论语派的缘起时，这个命题却可能提示另一些问题。论语时期，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对于文学的影响与20年代语丝时期相比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诸如文化中心的南移，新文学的出版业中商业化因素的加强，都市大众文化

曹聚仁：《言志派的兴起》，《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第267页。

苏雪林：《语丝与论语》，《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381页、第383页。

的兴起对文学样态的改变，自由主义思潮从20年代的普泛性到30年代的边缘化等等，都是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发生“变风”的不可忽视的外在促力，也是《论语》等刊物改变了《语丝》原有的精神气度和文化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原因。因此，当我们将论语派作为有个性的文学（文化）流派，探讨其文化品格的生成和文学审美形式的独特性时，不妨以文学、社会学的眼光，对促其生成的结构条件进行全面的认识，而不是预先将“语丝精神”设定为唯一的价值刻尺，将语丝派当作利器掷向论语派，或成为照出其“小”“没落”“颓废”的一面镜子。如此论语派的文化个性方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论述。

第一节 语丝时代的终结

社会学家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要获得承认，必须“经常与自己的听众进行交流、和自己的同事维持交往”：他们对听众宣讲自己思想，以获得心理上和经济上的满足；他们与自己的同行进行交流，以形成并检验自己的思想。近代以来，满足或影响这些条件的特殊制度，不外乎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和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波西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杂志等等。中国向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活动同样与这些制度化环境呈互动关系。换言之，在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机制、演变和实践中，既有作为制度化环境的文学期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书报检查制度、现代的大学体制等的影响，又有作为文学场（借用布迪厄的概念）的成员（作家、批评家或编辑等）的活动，两者发生着相辅相成、生生不息的种种联系，构成了一个网状与活动的“文学场”。其中的因素若发生变化，“场”

的状态也随之改变。

3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场，知识分子经历了政治和文化的大动荡后，思想的重组导致各方争端不断。借《语丝》和《骆驼草》两个刊物的命运即可大致窥探到：1927年移植上海的《语丝》在1930年宣告终结；同年，由周作人做“老老板”的《骆驼草》在北平静静开张。刊物的生生灭灭原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两个刊物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凸显出一种意义：语丝时代的终结。

文化中心的南移带来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的重大变化。20年代前中期，自由知识分子开辟了自由活泼和生动的话语空间。北平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学生态特征很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独特面目。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将近二十年的政治分裂中，军阀黥武主义“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无所作为，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利用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以批评为职事，各种或激进或保守、或先锋或平和等面目各异的期刊报纸，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中最重要的一种。对于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知识分子虽然仅仅停留于思想解剖的层面纸上谈兵，而非付诸法律、制度、政策的实施，却借助期刊报纸

参见以下书目：[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4页；[法]彼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356页。

等各种智力形式，促进了思想的繁荣。

20年代初中期的北京，现代文人们既有西式高雅的活动范式，如文艺沙龙、俱乐部、午餐会，也有东方式的以茶会友、小型聚会，或是大学校园内的学术活动，但刊物始终是向大众和自己的同行发言、传播信息、发表思想的重要媒介，它们成为纷繁忙碌及各种文学的社团流派生生灭灭的标志，营造了现代知识分子以思想或创作交流论辩的有机环境。1922年，文化保守主义文人以《学衡》加强对新文化运动的攻战，而胡适也以《努力周报》宣传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带有西方浓厚的绅士趣味、绅士作派的新月社则以聚餐会和俱乐部形式活动着，并怀着在政治、思想、文艺上打开一条新路的勃勃雄心。《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则进一步发展成20年代自由思想者的典型存在。不管是带着对新青年时期的战斗意趣和精神风貌的深深眷恋，还是持有对未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热情与建设性憧憬，或对刚刚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产生批判性反思，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以渴望“发言”的热情和欲望，执掌着自己作为“理念人”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像园丁一样相信自己能删杂除莠，改造社会和人类的本性。一幕幕现代知识分子频繁的交流活动，营造出一幅草长莺飞的繁荣图景，各种期刊和大小群体互相刺激，加入到政治、学问、道德和思想论战的中心。尽管其间也时常出现政府“禁售”“禁看”的谕令，却收效不大。语丝派文人多以大学为栖身之地，他们密切关注学生运动，所论人事多与学界相关，而学生的敏感与呼应也使得精英文人不至于有“戏台里喝彩”的无聊和孤独。对军阀镇压学生暴行的愤怒，对各种荒谬的整顿学风文件的冷嘲热讽等，使《语丝》在贴近现实中获得极大影响，不仅在北平的高校中流行，也为外地的学生所喜爱。章衣萍曾兴奋地报告：

“语丝行销一年，居然风行全国，销数之多竟与所谓水平线以上的‘大报’相伯仲。近据‘北新’老板以及老板奶奶说，上海某处学校学生四十余人，竟每人订语丝一份。这也难怪教育家们要慨然了。”这是典型的“学生社会”在社会思潮传播中产生的轰动效应。如此种种提供了知识分子以现代批评为职业及批评活动的生动范式。《语丝》的“不伦不类”“大谈特谈”“要说什么都是随意”“自由言论”“闲闲出之”等，指陈了发言心态的自由，但同样关乎发言环境的相对自由；《语丝》的出现看似偶然和不经意，却与20年代初中期文人结社、刊物林立、学生社会等等文化特征密切相关。

1927年12月，《语丝》移至上海出版，成为周作人所称的“沪版语丝”。这不过是一个信号，提示持续数年的文化和思想风气将发生实质性改变。直接原因是张作霖政府以“有伤风化”查封北新书局，《语丝》遭池鱼之灾。早在《语丝》南迁之前，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已经动摇，政治上，军阀走马灯似执掌政府，从段祺瑞执政府的“整顿学风文件”，“三一八”大屠杀，到安福系倒台，“狗肉将军”张宗昌上台，对文化人的迫害接踵而至。匆匆组成的摄政内阁所代表的北京政府，不仅政治上黑暗，经济也衰弱到极点：“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1929年，周作人在一封信中提到：“北平一切如故，北平大学无钱亦如故，李书华因女子学院问题无法办理，又因教员索

《语丝》第58期，1925年12月21日。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51页。

薪，乃一溜烟逃往南京，如此顽钝之人所未前闻，北平教育界人大有回想章士钊刘哲时代不胜今昔之感之慨云。” 政治经济文化的混乱，迫使大批文人南下寻找安全的栖身之地。鲁迅、林语堂等避祸南下，“居士”章衣萍去了上海，语丝社友几乎走完，“现代诸公在东南甚得法，新月书店又已开张”，大小出版社及各种刊物的纷纷南移。周作人不免感叹：“苦雨斋中不知怎的渐渐寂寞起来了，常来夜谈的几个朋友相率往南边跑去”，北京“在反动与投机的空气之中”“有点安静下来”，“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同古寺一般”。 社友星散，迁移则更挫《语丝》元气。以知识和思想自命不凡的自由派文人过去念念有词地要“隐逸”，盼望着树荫下的凉意，一旦真的失去太阳下的热气，竟有几分无奈。

政治文化环境已尘埃落定，南北统一，国民党定都南京，政治重心重新确定，“党治”与“训政”的阴影随即笼罩全国。如果说政治权力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占领文化权力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的话，那么国民党1927年以后的训政、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出台和民族主义文学口号的提出，具体到文化控制上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等，都说明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挟持政治权力，以国家和秩序的名义来清除前一阶段的思想自由空气，以求得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合二为一。它带来的是道消势长的局面，知识分子分明感受到言论环境的日渐窘迫，一部分文人遁入纯艺术的世界或学术的世界。南方国民党的“清党”开始后，周作人敏

黄开发编：《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第161页。

参见《知堂书信》，“致江邵原信三十一封”，第139页。

周作人：《通信——致章衣萍》，《语丝》第4卷第29期，1928年7月6日。

感到已无一个能够容纳言论自由、思想批评自由的言论空间，以知识和思想来与政治权威相抗衡的想象幻灭了。他曾经把南北之战设想为“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间的战争，现在则把国民党的清党和讨赤称作“以思想杀人”的棒喝主义，于是宣布过去那个“跳舞于火山之上”的自己已经毙命，从此“不食周粟”改为隐逸。

一方面北平文人对五四启蒙的力度与效果深感失望，而摒弃了对时事和政治的热情，另一方面原有听众、读者离去，知识分子公共舆论领导权几近丧失，边缘化成为事实，两者原是互为因果的。文化中心的南移并非仅是一种地理环境的移易，在感受到“冷”与“静”时，他们还分明感受到了“热”与“动”中的南方文坛正以无可置疑的优势宣布着新兴的文艺话语。借助文化中心的大转移，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也以新、进步和时代精神的强势话语撕开了与五四母体的血肉联系，并将五四的遗产置于“奥伏赫变”的位置。本来，文学场上文学竞争的中心焦点就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左翼文学话语的核心便是断言五四个性解放主题的衰微及无产阶级文学主题的推进和转变。宣布五四个性主义的落伍和过时，便将自己的先进性和进步性突显出来。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便是语丝派。北平谈“草”式的“有闲”成为30年代南方文坛的审判对象，几乎每一次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宣言都同时宣布着五四“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过去了”；几乎每一次对于“过去”了的作家的宣判，都直接点出新兴文学的“敌人”便是鲁迅、周作人和语丝派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几乎每一种讥讽的调子都对准语丝派“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和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三个著名的“有闲”成为语丝派的主要罪状。如果《骆驼草》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北平文

坛的萧条和北平文人的沉潜的话，沪版语丝的命运恰恰表明在上海这个忙乱的文化场上严重的心律失控，作为回应，它也运用种种新话语，讨论着时下的焦点话题，尝试着融入新的话语圈中，但最终还是在时时受到政府的警告、浙江当局的禁止、创造社式革命家的围攻及上海心浮气躁的商业化气息下陨落。时代思潮转向中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新一轮重组，对思想归宿再次选择。

1930年出版的《骆驼草》并非北平第一个透露出无奈的纯文艺取向的刊物。1928年11月24日发刊的北平《新中华报》在其文艺副刊的发刊词中说，五四以后的政局陷入了“不清不白”之中，“那些既以碰得头破血流而又走投无路的青年们，岂不应该在那染了血腥的草原上，闭上眼睛，或者抬起头来，望望星月，听听夜莺的歌声了吗？”该刊的文字不时感叹北京如沙漠一般灰色，如四月的坟墓般岑寂。周作人、冯至、杨晦、李霁野、徐玉诺等均有文字在上面发表。《骆驼草》的酝酿早于《语丝》，“骆驼社”的名称也一直存在，1926年7月26日，孕育了两年的《骆驼》文艺周刊出刊，只出了一期便停刊。到了1930年5月12日，冯至、林庚、冯文炳等编辑、发刊《骆驼草》，共出26期，周作人为特约撰稿人，实际上是刊物的主心骨。在沪版《语丝》结束的1930年，在《论语》尚未出世的时候，这个同人小周刊作为一种过渡，使周作人作为北方文坛盟主的地位渐渐凸现出来。一个

转引自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5月，第358—359页。

孙玉蓉：《谈骆驼社·骆驼和骆驼草》，《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脱离了北京的官气的刊物和一群黄连树下弹琴的“苦茶翁”、“吃莲华者”，便与一个尘埃落尽后寂寥的古都形象叠合起来，《骆驼草》越过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语丝时代，一下子进入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及“关乎学术”的无可无不可状态，学究者的“暮气”，趣味迷恋者的文化沉醉，纯文学创作者的心无旁骛，年轻一代淡漠的语丝情结，其读者对象也多为安静校园中的文学爱好者，不再喧闹的文化古都与大学校园，为北平原语丝文人弃公共话语而走入“艺术之境”的私人话语、走入学术性的知识主义话语提供了条件。他们自己划定了大学教授的文学活动与象牙塔之间的等号，学院成为高雅文化的保护地，但远在上海的鲁迅已失望地看到它“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这是必然的。由于地域之隔，上海报刊的焦点与热点到达北平时，往往已失去时效，当然也就失去了与文坛密切交流的时机，不再具有对读者的思想冲击力，也不再拥有互相交流或对抗的语境，即使美丽也只能孤芳自赏，低徊把玩。他们与30年代初的氛围格格不入。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在沪定居，普罗文学大旗的挥舞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铿锵有力的批评语气、欧化拗口的时髦词汇、革命加恋爱题材、带着某种病态的革命者形象，成为20年代末最流行的批评模式和创作模式。大本营南迁之初的混乱、嘈杂，使一般读者不可能也无兴趣去静心聆听那已被时代大潮淹没了的声音，潜隐着的思想锋芒，已不为浮躁和激进的青年所了然。

从《语丝》到《骆驼草》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思想专制、话语权旁落、启蒙心情颓丧，是导致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在二三十年代社会与文化转型期间“改变作风”的一个原因。《骆驼草》的韬晦使人们一再感慨《语丝》的“天真勇敢”不复存在，指责五四一代文

人的暮气沉沉，这些指责过于强调作家在“革命”之后个人心理意念的改变作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而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一个可以追求思想的超越与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骆驼草》作家们对新的文化空气下思想与文学某些新型病症的诊断，都是后来论语派的先声：宣布自己“不谈国事”，“立志做‘秀才’”，是对专制政治的不满；湮漫于中的文艺情绪的高蹈，是要以“孤孽子”的纯文学形象与“革命文学”区别开来；至于开始“说八股”，重提公安竟陵小品文，则有更深的思想隐喻。孤立地存在于北平文化荒漠中的《骆驼草》，有意使自己与大众、官方意识形态、左翼文艺主流乃至与自己“过去的生命”分离开来，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取代了对文学社会价值的追求。而这种遗世独立，本身就是珍稀的文化资本，真到文章“无处可卖”或有了适意园地时，投入到文学场中便会产生重要影响。

第 二 节 “ 变 风 ”

上述论及语丝派的形成、发展和解体，可以看到，在社会、时代、政治和文化所施以的各种力量作用下，制度化环境的改变对知识分子行为和心态将产生深刻影响。论语派的生成同样离不开外力的推动和挤压。比起京兆布衣及其京派追随者僻居北平相对单纯的文化空间而言，论语派出现在一个更复杂的时空

直到1932年，刊物的缺乏仍困扰北平文人，周作人在写给上海《现代》的主编施蛰存的回信中特别提到：“有李君广田在北大英文学系，亦从鄙人学日文，作散文颇有致，卖文苦学，而北平近来无处可卖”，见周作人：《致施蛰存》，《周作人集外文》下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第429页。

中：较之20年代、30年代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机制，即文学市场和出版界发生了质的变化；较之20年代知识分子相对自由的批评形态，国民党政府以文化专制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大大缩小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较之语丝时期的文人多有公共职务和大学教职，尤多以传道授业解惑为生存根本，30年代上海文人文学职业化程度大大提高，作家、批评家或文学编辑等进行的的活动，既参与了文学作品的生产，也通过与文学市场的密切联系推动着消费者生产。另外，依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关于“文学场”的“占位的空间”理论，占位空间的改变取决于知识场与权力场之间的关系变化，当一个新的文学或艺术集团在场中推行开来时，整个空间都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产品可能被推到次等或其他的位置上去。30年代的情形很典型地印证了这一理论，但是知识场与权力场及新的文学集团之间的关系，却显然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尤其体现为，国民党政府的文艺集团并未随着其统治地位的稳定而占据主流文学的位置，反而是其对立面的左翼文学思潮随着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空间里确立了其主要位置，而原先作为主潮的自由主义文学退至“次等”。因此，每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与其他文学形态产生互动的结果，也是受到来自政治、商业、文化空间中各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

就政治空间而言，靠思想的禁忌与规训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反而导致文化人对政治权威的离心力增强，而权威一旦失去文化的支持，也失去其合理性，历史上便常有道消势长的情形发生。30年代，国民党实施严格的报刊检查制度，并对异己文

化人进行暴力镇压，试图以这种强有力的异化手段，以思想专制和舆论控制来制止知识分子的大逆不道。然而，书报审查制度同时也使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发生更大更快的离异，国民党此举与前番的清党，除了加速将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逼向自己的对立面外别无益处。左翼文学兴起后便很快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专制政体。同时受到政治审查与道德审查双重胁迫的郁达夫更不乏“义士纷纷说帝秦”的诗句，直刺国民党政治运作和文化政策。至于众多报纸杂志开天窗、文人钻文网、字里行间冷嘲不断、杂文兴盛等，更是文坛颇具政治意味的图景。30年代报纸杂志的大繁荣表明：“审查制度造成了始料不及的后果，它启动了自由事业与智力活动的现代联盟。”立场各异的作者们在同审查官的较量中有可能达成一个共同体。

上海作为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历史位置，也使政治的威吓力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在穿透多元与多层次的市民文化和商业文化网络后总是难以维持原样。30年代的文学生产、出版、流通和消费机制，尤其是报刊出版等传播媒介的发达、租界特殊的法律与政治制度，为各式文人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北方文坛的兴衰总是与政治的松紧发生反应，当它在政治中心失陷后步入冷寂沉静时，30年代上海的文学作坊却因为有着北平所无的工商业经济地位而可以源源不断生产出各色文学作品，上海“文摊”上，当然也热烈地贩卖着性质各样的文学商品：被新文学视作低级的缺乏艺术价值的消遣性小报，海上才子们主笔的文艺副刊，左翼文学的激进思想和现代化都市中先锋艺术家的颓废感情等等都能找

到自己的消费群。侧身于都市文化环境中，连自视甚高的新文学也有意无意地兼顾了软性文学的娱乐功能和闲适格调。上海文坛的多元景观，其意义不在于一种和睦共存的状态，相反，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围绕文学的合法性这一焦点，争夺着自己的话语垄断权，每一种文学话语都意味着对其他话语的规训。

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文化、商业文化同构的文学场上，《论语》最初发刊时，作家们的心态很有普遍意义，下面的担心很可以理解：“我们只消看看自九一八事体发生后，一时大小刊物的茁起，确大有雨后春笋之观。而这些一切大小的刊物，大部分又都像在演京戏似的；有前台的唱演，有后台的摆布，有大锣大鼓的号召，有男女观众的叫好。我们在这锣鼓喧天，人声庞杂的时机，仅仅凭几位清唱的角色，要是一时嗓子太低了，还不是一点唤不起大众的关注。就算是嗓子高的话，谁又保得住没有一些意外横祸的飞来？”这段表白相当生动，包含了论语派作家的缜密心思：复杂的而带危险性的政治禁忌无法遏制人们说话的欲望，新的社会文化结构又在某些方面提供了人们发言的机会，所要考虑的只能是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在文学场上站稳脚跟。

论语派的“变风”，指的是它继承语丝派而来，却改变了语丝派原有的风貌。无论在政治立场、文学立场还是雅俗文化立场上，都体现出论语派的“中间性”。

首先，政治上的中间立场，是自由主义者在言论不自由的政治环境中所选择的主要话语策略，它也决定了论语派刊物的定位和文化倾向。施蛰存忆及自己创办《现代》这一大型刊物时，有意走一条“中间路线”。而林语堂对《语丝》的记忆和想象也坚

怪力：《子不语》，《论语》第1期，1932年9月16日。